

AI替代了反思,我们如何找回写作的灵魂?

■郭英剑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AI)工具快速渗透的今天,写作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只需几秒,ChatGPT就能产出流畅、合乎逻辑,甚至略带“人情味”的段落,因此许多学生开始依赖它完成课程论文、申请书乃至个人陈述。对许多人而言,这似乎是效率的胜利——写作不再是长时间煎熬、反复推敲的劳动,而变成一次简单的“提示—生成”操作。

然而,8月11日《美国高等教育纪事》刊登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写作讲师埃伦·惠泰特的文章提醒我们,这种便利背后潜藏着风险:AI虽能模仿叙事的结构,却无法替代人类的挣扎、犹疑与真实情感。当写作不再是与自我的对话,而是退化为与算法的协商,我们或许获得了完美的句子,却失去了写作最珍贵的部分——反思与自我理解。

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AI工具的大规模普及,学生在写作中经历的“认知生成”与“情感加工”环节正在被悄然削弱。

因此,在效率与真实、便利与灵魂之间,我们必须重新提问:写作的意义究竟何在?在AI时代,教育者、学生与技术之间需要建立怎样的新关系,才能让写作重拾自我发现与思想塑造的价值?

当ChatGPT替代了思考,写作正在失去灵魂

写作从来不仅仅是文字的堆砌。无论是个人陈述、课堂论文,还是思想随笔,它都承载着一个核心使命:在语言中与自己对话,在叙述中寻找意义。正如美国学者琳达·弗劳尔和约翰·海耶斯在“写作认知模型”中所指出的,写作的本质并非记录,而是思维与表达之间的动态交互;人在不断生成、组织、修改语言的过程中,重构自己的认知结构和自我理解。然而,随着ChatGPT的介入,这一艰难的生成过程正在被悄悄取代。

惠泰特在文章中讲述了一个现实的困境: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撰写个人陈述时直接依赖ChatGPT,因为它能够“模仿叙事的节奏、语调和逻辑”。在ChatGPT的帮助下,学生们交出的文本往往结构完美、句式流畅、立场中立,几乎没有可挑剔之处。然而,惠泰特认为,这恰恰是问题所在。ChatGPT可以写得“他人如何讲述自我”,却无法真正理解“自我经历了什么”。

这一点在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中也得到印证。根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写作研究实验室2024年发布的一项实验报告,在两组写作任务中,一组学生手写初稿,一组学生在ChatGPT生成初稿。结果发现,手写组学生在后续修改中主动重构核心论点的比例达到63%,而AI初稿组仅为17%。这意味着,当初稿直接由ChatGPT生成时,学生大多选择被动微调,而不是重新思考文本与自我之间的关系。最终,AI初稿组的写作在“论证深度”与“自我反思”两个维度的评分显著低于手写组。



应教会学生如何与AI共存,而不是被AI取代;应帮助他们意识到,ChatGPT可以生成句子,却无法替代人类的感受、价值与判断。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个充满算法与自动化的时代,守住写作作为思想生成器、灵魂触发器的独特价值。

从更广泛的调查数据来看,ChatGPT的普及正系统性改变学生的写作行为。根据美国《高等教育内幕》6月11日的一篇报道,大约有2/3的美国大学生承认在写作中使用过生成式AI工具,比如ChatGPT,另有30%表示使用嵌入课程平台的AI工具。如此一来,相当于90%以上的学生都在使用AI工具。可以推测,他们的写作任务在形式上无疑是完成了,但作为认知与情感整合的教育过程,却可能空心化。

然而,写作的灵魂在于“在写作中重新理解事情”。在亲手书写、不断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犹疑、挣扎甚至痛苦,这正是思维被推向更高维度的时刻。而当ChatGPT取代了写作最艰难的部分——初始的构思与表达,学生或许交出了一篇“合格”的文章,却错过了自我发现与思想塑造的契机。

AI的便利陷阱与原初力的隐形侵蚀

如果说ChatGPT在最初阶段让学生“失去了思考的机会”,那么它带来的第二重影响则更加隐蔽:当效率成为写作的首要目标,原创性正在被悄然侵蚀。

惠泰特在文章中谈到,许多学生坦言,使用ChatGPT的原因并非缺乏写作能力,而是“AI可以更快完成任务”。只需输入几个提示,工具就能生成逻辑清晰、用词优美的文章——这让不少学生觉得,既然结果一样,为何还要花时间问自己?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生成式AI的便利,确实诱导学生过早满足于“表面完成”,而不再追求“思想完成”。依据今年5月13日《商业内幕》的报道,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院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使用AI的主要原因是节省时间”,大概占比为51%。实际上,在大学生中,这个比例还会更高。而且,少有学生会生成内容进行大幅修改。换句话说,对多数学生而言,写作已经从“思维过程”退化为“生成管理”:他们不再写作,而是选择、筛选、拼接。

如果说效率的追求是显性的,那么语言的趋同化则是隐性的,同时也更危险。ChatGPT

擅长生成高度流畅的句子和连贯的段落,但在训练中依赖大规模语料库,结果往往是输出“平均化”的语言。这让许多文本看起来“无可挑剔”,却缺乏个人痕迹。

这一问题在申请文书中尤为突出。今年3月26日来自arXiv的一篇论文分析了本科申请文书的AI生成与人类写作之间的差异,发现AI写作产生的文本在语言层面高度趋同,几乎无法通过提示匹配特定身份群体的语言模式。换句话说,这种语言趋同化不仅让学生丧失了表达自我的机会,也让写作失去了最重要的价值——在文字中呈现独一无二的思想。

这对教育者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如果学生习惯于依赖ChatGPT生成论点与段落,他们不仅可能失去写作能力,还会逐渐失去写作的兴趣。最终,AI带来的并非思想的扩张,而是知识的收缩。

检测、禁令与焦虑之外:如何重建写作教育的核心价值

面对生成式AI带来的冲击,许多高校的第一反应是“禁止”或“检测”。AI写作检测工具在过去两年迅速普及,甚至成为某些大学课堂的必备要求。然而,更多的教育者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单靠技术管控,并不能解决写作“空心化”的问题。

首先,检测工具本身并不可靠。今年《高等教育内幕》的一项调查显示,14款AI检测工具经检测,均未达到80%的准确率,且误报率在非母语学生群体中更高。如果误报率高,就难免让教育者陷入“防御性教学”的怪圈:花更多时间核查,而不是引导。

更值得注意的是,AI工具并不会让学生“停止写作”,相反,它们正在重塑“写作的意义”。如果写作在教学中被简化为“产出文本”的任务,那么学生自然会倾向于寻找最快的完成方式,而ChatGPT恰好提供了这样的解决方案。焦虑与禁令,只会让学生与教师陷入对立,而无法真正让写作回归它的教育本质。

因此,我的建议是,与其排斥AI,不如拥抱它、理解它,并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负责任地

使用”。而在这方面,美国耶鲁大学等已经走在前列。

据耶鲁大学2023年11月21日报道,该校英语系教授葛雷萨开设了一门名为“AI辅助写作”的新型英语研讨课,教学生如何理解生成式AI对写作的影响。其中,小作业要求学生主动使用ChatGPT并对其输出进行反思和引用,引导学生理解AI并非代笔写作主体,而是一种工具。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今年4月22日的报道中也提到,一些教育工作者已鼓励学生在使用AI工具时进行记录与反思。

在我看来,AI写作的问题不能只在技术层面上解决,而是要回到教育的根本命题:为什么写作?

写作从来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是为了在语言中组织思想、理解世界、认识自我。因此,教师的责任不是阻止学生使用AI,而是帮助他们生成与反思之间找到平衡,让写作重新成为“思想的生成器”而非“文本的制造机”。

正如惠泰特在文章中所强调的:“AI可以复制你的句子,但无法复制你的经历、你的犹豫、你的情感。”如果教育不能让学生理解这一点,再先进的检测技术也无济于事。真正的解决之道,是让写作从“完成任务”回归“生成思想”的过程。

在生成与反思之间,重拾写作的灵魂

生成式AI的到来,正在深刻改变写作的生态。它让我们写得更快、更顺畅、更“完美”,却也让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但我一直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ChatGPT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如何理解写作的价值。

禁止AI并不能让学生更好地思考,检测工具也无法真正维护写作的真实性。教育者需要做的,是帮助学生在“生成”与“反思”之间找到平衡;允许学生使用AI,但更强调写作中的自主性与创造性;承认技术的存在,但更关注思想的生长。

写作从来不只是完成一篇文章,更是一次与自我对话、与世界相遇的过程。它要求我们在表达的挣扎中重新理解自己,在反复的修改中形成更清晰的思考。在AI的到来迫使我们重新定义这一点:写作不在于产出多少,而在于我们在写作中经历了什么。

未来的写作教育应超越“惩戒与防御”的逻辑,而转向“理解与引导”。我们应教会学生如何与AI共存,而不是被AI取代;应帮助他们意识到,ChatGPT可以生成句子,却无法替代人类的感受、价值与判断。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让在这个充满算法与自动化的时代,守住写作作为思想生成器、灵魂触发器的独特价值。

写作的意义,不是写下什么,而是写作如何塑造我们。AI的出现,反而提醒我们:

唯有亲自经历思想的犹疑与语言的挣扎,我们才能重新找回写作的灵魂。

以开放性为核心深化我国高校学科交叉平台建设

■林成华 张维佳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有组织的学科交叉研究与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正成为推动科技自立自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

作为其中的重要载体,学科交叉平台正发挥日益突出的战略作用。2022年8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进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提出设立基础研究和交叉学科专项,并强调高校在服务国家战略中的使命担当。2023年5月,教育部学科交叉中心试点建设调研推进会举行,明确以组织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为抓手,推进高水平学科交叉研究和育人平台建设。

目前,我国高校围绕学科交叉平台已在组织架构、制度文化、学科团队、资源工具建设等方面进行探索并取得积极成效,但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挑战,亟待系统优化与深入研究。

建设现状

自教育部启动高校学科交叉平台建设试点以来,全国32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相继获批,形成了覆盖理、工、农、医、人文社科等多领域的交叉平台体系。总体来看,这些中心虽因校情差异而呈现多样化运行模式,但在顶层设计上均围绕“破壁跨界、协同育人”的共同目标展开:在组织上强化中心统筹与分中心协同并重的治理逻辑,在制度上聚焦学科评价改革与资源倾斜双轮驱动,在人才上强调长期育人共同体与项目导向动态团队并行,在资源上兼重定向投入与开放共享。由此,一套以跨学科问题为牵引、以平台化运行为特征、以育研一体为核心的交叉中心建设范式正在我国高校逐步成形。

这些学科交叉平台在组织架构建设方面,通过“中心—分中心”层级与专业行团队支撑,实现决策集中与执行弹性的结合;在制度文化建设方面,以经费、招生、评价等倾斜措施推动交叉学科由边缘走向核心,并通过课程贯通与学术活动培育包容、多元的交叉氛围;在学科团队建设方面,以长期师资共同体与短期

项目团队建设并存的“双轨制”,既保障教学前沿性,又灵活匹配科研攻关需求;在资源工具建设方面,除专项经费与指标单列等补充性资源外,引入长期交流平台、MOOC等发展性资源,降低多主体参与门槛,促进知识共享与快速更新。

现实挑战

尽管我国高校学科交叉平台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但在制度设计和资源配套等方面仍存在系统性短板,整体开放水平与可持续性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一是“学科归口”惯性仍然存在。研究生培养、导师聘任与成果认定大多依托院系实施,跨学科课程设置与学术弹性缺乏刚性政策支持,评价指标仍聚焦单一学科成果,导致平台在招生、学位授予和质量保障上的自主权受限,难以形成真正“平台主导、院系协同”的育人格局。

二是资源供给系统性有待提升。中央与高校虽下放部分经费与人员配置权,但多为一次性、项目型投入,缺乏“基准拨款+竞争增量”的持续机制;科研启动资金、科研设备与博士指标常被拆分列管,难以满足长期任务与高风险交叉探索需要,对平台集成资源和快速响应国家需求形成阻碍。

三是跨界师资激励有待加强。双聘教师归属不明,人事考核与绩效分配缺失;产业导师受知识产权、时间成本等约束深度参与受限,导致“学术—产业”双轨指导体系名义大于实效,影响协同育人成果转化率。

四是公共支撑体系建设相对滞后。面向全校共享的课程云平台、数据开放接口和技术转移服务尚未形成闭环;平台治理制度缺少标准化流程与数字化监测工具,难以支撑教育、科研、产业链协同运行。

“四个开放”

针对我国学科交叉平台目标定位和试点

建设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挑战,笔者建议以“四个开放”为核心推进高水平学科交叉平台建设。

一是开放组织结构,需聚焦发展定位,构建消融边界与分权协作并重的运行体系。

当前,我国学科交叉平台仍处于试点探索阶段,平台功能定位有待进一步明晰,中心与外部组织的空间联结性较为有限,整体运行仍存在“封闭化”“碎片化”等问题。首先,国家层面可将学科交叉平台建设纳入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重大布局,进一步明确定位点、发展目标与支持机制,并设立专项支持机制,强化政策引导与体系保障。其次,支持若干代表性高校牵头组建区域性或全国性学科交叉平台联盟,推动中心间基础设施共建、交叉课程共设、研究项目共研和人才培养共育,打破高校间中心重复建设、方向重叠而协同不足的局面,切实提升平台整体布局效率与国家战略服务能力。最后,在组织结构逐步开放的基础上,推动高校构建更加高效的运行机制,如引入专业化行政团队、落实首席专家负责制,明确职责分工,强化跨学科项目之间的沟通协作,提升组织执行力。

二是开放制度文化,需打破学科壁垒,构建灵活自主的运行制度与组织授权机制。当前,学科交叉平台在制度设计与平台运行中仍受到学科跨界壁垒、人事体系和评价机制的限制,协同效率不高。首先,要逐渐打破“学科归口管理”的惯性束缚,支持设立不依附于传统一级学科的“交叉学科实体单元”,赋予其在课程建设、人才引进和成果认定等方面的制度自主权,推动构建结构平权、规则开放的制度体系,使交叉学科真正成为独立、平等的学术发展单元。其次,高校可探索设立学科交叉岗,由平台作为责任单位统一管理与考核,允许教师跨学院跨学科招生。最后,鼓励学科交叉平台在地方政府与行业企业支持下,与企业、行业组织围绕前沿问题共建研究平台、教育基地与创新实践平台,营造鼓励交叉、容错试错、价值共创的氛围。

三是开放资源体系,需聚合资源要素,形成交叉育人与创新转化的联动机制。

当前,我国学科交叉平台在资源支持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投入碎片化、平台资源相对封闭、人才与项目脱节等问题,未能形成系统集成的支撑体系。首先,国家层面可考虑设立学科交叉平台专项资源池,取代单一滚动资助模式。资源池采用“基础+竞争”分配机制,每年为每个中心提供固定基础经费,剩余部分通过跨学科联合评审竞争分配。其次,鼓励高校依托学科交叉平台设置“博士+硕士”双学位项目,配置专项资源,开发交叉课程同时满足博士、硕士学位要求,并试点推行“一份论文、双份认证”,以跨学科论文满足双学位要求,同时平衡一批国际联合培养计划和产学研协同育人项目。最后,持续优化技术转移与人才共享机制,整合高校技术转移办公室、地方孵化平台与行业中介机构,推动形成“资源—人才—项目”三位一体的转化路径,为交叉成果落地提供全链条服务。

四是开放评价治理,需改革管理机制,构建多元协同的评估体系。

当前,学科交叉平台在组织绩效、项目执行和人才管理方面仍沿用传统学科导向的治理模式,难以有效支撑协同创新与跨界合作。首先,探索建立以协同创新为导向的学科交叉平台建设绩效评估机制,将“跨学科贡献”“交叉成果”“创新影响”等作为核心指标,并在项目评审、职称评定与人才奖励中加以体现,推动科研评价向问题导向与协作导向转型。其次,建立涵盖“规划—执行—评价—反馈”的全过程监管体系,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与治理透明度。最后,深化学科交叉平台人才管理,构建“骨干+协同+产业”三维团队模式,配置专项资源支持常态化联合申报、跨机构定期交流与协同研究机制,优化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营造协同高效的组织氛围,提升系统集成与持续创新能力。

(作者分别为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和博士生)

中国大学评论



张端鸿
同济大学
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在当下的高等教育格局中,关于高校“该办成什么样”的问题,始终是政府、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焦点。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这些被频繁提到的类型,构成了国家对高等教育分类管理的基本框架。地方高校尤其被要求明确自身类型,清楚回答“面向谁办学”“核心功能是什么”。这些定位无疑为地方高校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

然而,仅仅停留在分类和口号层面是不够的。如果高校只是在文件中标注为应用型或研究型,面向谁或者服务谁,却没有形成自主发展的内在逻辑,那么再清晰的定位也难以真正落地。真正决定高校能否走得长远的,是其能否建立起一套稳定、自主、可循环的办学逻辑。

逻辑之所以比定位更重要,在于它关乎学校发展的内核。定位是静态的标签,而逻辑是动态的机制。定位可以由外部规定,逻辑必须由学校自身形成。政府可以告诉一所高校应该面向谁办学,但如果学校没有形成支撑这一定位的逻辑,那么这个定位就是空洞的。反之,如果一所学校建立起完整的办学逻辑,它自然会在实践中形成与区域发展相匹配的定位。逻辑驱动定位,而不是定位驱动逻辑,这应当成为地方高校发展的基本共识。

现实中,地方高校最常见的困境就是“定位—逻辑错位”。许多学校在文件中高喊“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打造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但在内部运作上仍是另一套逻辑:依赖招生规模保证经费,依赖零散项目维持学科建设,缺乏清晰的逻辑路径。这种逻辑可以维持学校生存,却无法支撑学校成长。一方面,定位高度同质化,几乎所有地方高校都在强调服务地方和产教融合,缺乏差异化;另一方面,逻辑停留在维持层面,资源投入呈点状分布,难以形成生态聚合。结果就是学校表面上有定位,实践中逻辑缺席,导致“方向明确而路径混乱”。

如果说分类与定位是外部赋予的身份,那么逻辑就是内部生成的机制。逻辑的首要价值在于能够赋予学校主动性。定位依赖外部,而逻辑代表学校的自我谋划能力。只有当学校建立了自主逻辑,才能在外环境不确定时保持韧性。

这种逻辑必须是自下而上的,并与地方和区域的发展紧密结合。学校首先要立足自身的基本盘,确保招生和基础学科的稳定,这是存在的前提。更重要的是要找到特色突破点,从自身禀赋出发,形成真正能够支撑学校品牌的学科方向。例如,处于产业集群周边的高校,应选择性集聚某一产业链环节,把学科建设与区域经济高度耦合,而不是盲目追逐风口。同时,特色突破必须通过资源汇聚才能放大。地方高校要突破跨学科平台,推动产学研深度协同,把政府、企业、社会资源整合进来,形成生态网络。最终,逻辑的目标是形成循环放大的机制,从基本盘到特色突破,从资源汇聚到生态构建,再反过来强化基本盘。这种“逻辑链条”一旦形成,学校的发展就不再依赖外部赋予的定位,而能在实践中自然形成符合国家战略和区域需求的定位。

遗憾的是,许多地方高校仍停留在“维持逻辑”。这种逻辑的显著特征是保招生规模、保财政拨款、保基础运转。在过去扩招和财政宽松的环境下,这一逻辑尚能维持,但在今天高等教育进入存量竞争、区域竞争日益激烈的格局下,维持逻辑已经难以为继。地方高校要突破,必须实现逻辑的转型。这意味着要从规模逻辑走向质量逻辑,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核心;从项目逻辑走向体系逻辑,避免零散项目支撑学校的脆弱模式;从被动逻辑走向主动逻辑,不是等政策引导,而是自己先谋划再对接;从孤立逻辑走向生态逻辑,让自身嵌入更大的区域产业和社会发展网络。

逻辑优先并不是否认定位的必要性。定位依然是对外界的身份呈现,是学校存在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定位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逻辑能否承载。如果学校缺乏逻辑,再清晰的定位也无法落到实处;而一旦学校形成了逻辑,定位自然会在发展过程中生长出来,并且会随着地方和区域的发展逐步调整和优化。

因此,地方高校的发展不应停留在“被定位”的层面,而必须真正建立起自主发展的办学逻辑。学校要有“以我为主”的战略自觉,先回答“我凭什么发展,我如何发展”,再去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陷入盲目跟随与机械模仿的陷阱。地方高校唯有如此,才能在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中找到真正的立足点,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形成不可替代的角色。

办学逻辑比办学定位更重要